

甲子学者 治学谈

上编：论文

从语言研究看语言的共性与差异性 / 端木正

辩证语法与语体语法的关系及其之间的辩证转换 / 冯胜利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四思考 / 傅莹琪

北京官话的声调及其声调——兼论声调“啊”“吧”的性声 / 陈

从实际语料看看态学理论的发展 / 蔡

“数—”“名义”格式之“数”“名” / 高翔 / 李亚非

论语法概念的史前科学性 / 李亚非

语言技术对语言生活及社会观念的影响 / 李白桦

文苑珍闻：提升个人、精英精英及其他

——论网络传播相关理论与理论实践在汉语句法研究中的应用 / 仇一

从“语言与第二语言习得”看语言能力及研究 / 于建刚

从“语言区域”一词之类别转变及语言特征 / 徐

从“语言与语体”看语体及语体理论 / 徐

教学语法研究的内涵与方法 / 周小

下编：随笔

我的人生经历 / 端木正

学者人生 / 冯胜利

全楼陪都：数语博雅 / 傅莹琪

语言的创造 / 高翔

“数—”“名义” / 李亚非

人生随想 / 三个二十 / 李亚非

我怎样读 / 李亚非

从“数—”到“名义” / 李亚非

一直在路上——从十年人生回顾 / 仇一

高翔二十年 / 蔡

时不往 / 徐

在 / 徐

于 / 周小

主 编：冯胜利 李亚非 沈 阳

执行主编：沈 阳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目 录

上 编：论 文

- 3 从音系研究看语言的共性与任意性 / 端木三
- 28 韵律语法与语体语法的机制及其之间的相关原理 / 冯胜利
- 59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再思考 / 何宝璋
- 81 北京话甚低语调及其功能——兼论语气词“啊”“吧”的性质 / 贺 阳
- 95 从实例分析看音系学理论的发展 / 蒋 平
- 119 “以……名义”格式之“名”“实”考辨 / 李向农
- 132 论句法研究的实证科学性 / 李亚非
- 168 语言技术对语言生活及社会发展的影响 / 李宇明
- 187 变换移位、提升并入、拷贝删除及其他——与结构变换相关的句法分析理论
 及在汉语句法研究中的应用 / 沈 阳
- 208 语言调节与第二语言学习者语言能力发展研究 / 王建勤
- 230 甘青语言区域——语言类型转变及语言替换 / 徐 丹
- 252 汉语侗台语接触类型及相关理论探讨 / 曾晓渝
- 275 教学语法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周小兵

下 编：随 笔

- 305 我的人生经历 / 端木三
- 320 学术人生 / 冯胜利
- 336 金陵随笔：跌跌撞撞到耳顺 / 何宝璋
- 340 往事的回想 / 贺 阳
- 344 一路拾“肥”到耳顺 / 蒋 平
- 350 人生逢甲子，三个二十年 / 李向农
- 357 我的读书经历 / 李亚非
- 361 书之缘——写在甲子之年 / 李宇明
- 372 一直在路上——六十年人生风景一瞥 / 沈 阳
- 385 向学三十年，转瞬一甲子 / 王建勤
- 389 时不我待 / 徐 丹
- 392 六十随笔 / 曾晓渝
- 396 半世耕耘且做零 / 周小兵
-
- 412 后 记 / 沈 阳



冯胜利 1977级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先在历史系攻古代史，两年后又考入中文系，师从陆宗达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主修《说文》及训诂学。1982年毕业留校，教大学语文和古代汉语。1986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Annenberg Fellowship 奖学金，赴美从拉波夫（William Labov）、柯劳克（Tony Kroch）和里博曼（Mark Liberman）学习社会语言学、历史句法学以及韵律学；1995年获博士学位。1994—1999年在堪萨斯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任助教，1999—2003年在该系任副教授。2003—2010年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汉语应用学科教授、中文部主任、哈佛北京书院主任。2005年任北京语言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08年至今任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语言暨语言学》副编辑。香港中文大学—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联合研究中心主任。曾兼任国际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北美汉语教师协会常务理事，以及近十种国内外语言学及语言教学杂志编委和国内外语言学杂志与出版社的审稿人。主要研究方向为训诂学、历史句法学、韵律句法学、韵律诗体学、语体语法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包括：（1）训诂学，提出文意训诂与同律互证法；（2）韵律和句法的相互作用，开辟

韵律句法学的研究(《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已被译成韩文、正在被译成日文);(3)韵律与诗体的关系,提出“三音不成步、五言不为诗”的诗体来源;(4)语体语法,提出“当代书面正式语体”的概念及语体语法的理论系统;(5)历史句法学,提出汉语史分期以韵律形态为标志,二分为东汉以前“音段形态类型”的综合型语言(synthetic language)和东汉以后逐步形成的“超音段形态”为主要的分析型语言(analytic language)两大类型。出版学术著作有《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汉语韵律句法学》、《汉语韵律语法研究》、*The Prosodic Syntax of Chinese*、《汉语韵律诗体学论稿》、《三一语法》(合著)。出版教材有《古汉语基础》、《汉语书面用语初编》、《入乡随俗》、《文以载道》等。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语文》、*Linguistics*、*East Asian Linguistics*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中英文论文百余篇。

我从小就羡慕学者，我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77 级本科生的前一年，全国上下都在搞“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

我上四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对一个四年级的小孩儿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上课了，非常好玩儿。但是没过两个月就感到特别失落，因为什么课都没有，成天拿着假枪打仗，打着打着就没意思了。那就是小孩儿的“文化大革命”。不久我发现大人们都在烧书，贴大字报，然后游斗。这方面事情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但对我个人来讲，我当时觉得书也没了，老师也没了，课也没了，早上起来之后就是玩儿，玩儿也没意思了。于是在烧书的时候就想能不能拿一本书呢？据说那些书都是有毒的，谁都不许碰，必须要烧掉，拿锅盖那么大的铁锹铲着书往书堆上堆，然后就放火烧，火很大。但其中有一人，工作不小心，他一甩就把一本小书甩到了路边沟里头，我就偷偷地拿走了。我想这回可以回家看看到底有什么毒啦，回家一看，是《新华字典》，这就是我那时唯一可看的東西。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开始复课了。恢复以后也上一点儿课，于是到 1970 年、1971 年的时候，中学毕业。据老师说，我在学校里学得还算不错。那年毕业，我们之前的那一届毕业的人很多都“上山下乡”了，到了我们这届，不用都“上山下乡”了，一部分人可以到工厂，大家当然很高兴，我们也等着机会，结果呢，分配还是让我不高兴。虽然不用“上山下乡”，但让我到北京第二师范学校进修一年，出来以后做“臭老九”——当中学老师。“臭老九”谁愿意做啊！当工人多光荣啊。但也好，我原本是想看书的，没有书，找了一本《新华字典》认了不少字。一听说当老师，即使不高兴也不特别难受。首先是不用“上山下乡”了，其次是有书念了，那就行了呗，到中学去看书吧，当臭老九就当臭老九！

结果呢？分配的时候告诉我，不让我念文学。念文学将来就能教语文了。为什么不让我学文学呢？老师说我的学习好，所以得去学数学，将来当数学老师，教代数、几何。我就求当时管分配的老师，能不能给我换一个班呢，让我去学，比如历史也行啊，教历史、教语文都行，可是就是不让换。我从小就喜欢文学，结果捏着鼻子在北

京第二师范学校（就在白纸坊那个地方）学了一整年的数学。进修数学以后，就在中学教了整整五年的代数和几何。我的学生比我小两三岁，就这么过了五年。不过对我也有锻炼，因为那时候我当班主任，大概是1972年到1977年之间吧，我在和平门中学教书。北京市的中学生怎么样，我这里不想多说，我是班主任，其中的甜酸苦辣，我想等我再过十年退休以后写回忆录时，写写那段时间的亲身经历，写写那时候我们是怎么做班主任的故事。只举一个例子，一个教研室同事下了课拿着书回办公室，她怀孕了挺着肚子往回走，一步一步，刚到操场中间，一个砖头“嘣”地就砸在她的脑袋上，“哗”的一下血就下来了，她扑通坐在地上，人们马上叫车送急救。每天差不多都有学生或老师被打破头的事件，这就是当时的学校。学生们打老师不奇怪，“臭老九”嘛。有一个年轻女老师上课进教室一推门，“嘣”的一声，上面一盆水落下来，浇了一身水，这位年轻老师哭着跑回去。怎么办呢？赶快换衣服，再上课。那是常有的事。学生打老师，学生打学生，甚至还有用刀子的。就在那种环境下，我坚持教数学教了五年。

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我考上了77级的北师大历史系本科生。上历史系的原因很简单：第一，我一直喜欢文科；再有就是在1973年的时候，我遇到了影响我一生的机会。什么机会呢？这要从我教数学说起。我教数学，但我喜欢文学，所以没事的时候就在下面写一点儿古诗。在那个时候写古诗不是很好的行为，因为你不是在学习毛主席的思想，也不是在学习马列的思想，所以老师们在传看我的古诗的时候，背后就说这个小伙子有点儿不像话，喜欢封资修的东西。这话传到了我们一个老师的耳朵里头，她说你把你的古诗拿来，我给你找一个人看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说我写的东西不给外人看的，我怕说我是封资修。她说：“我爸爸懂古诗，你要是想写古诗的话，他可以帮你看，但是你不要告诉别人。”她就是我的导师陆宗达先生的女儿，陆敞老师，我一直叫她陆老师；她跟我一块儿在和平门中学（当时是第180中学）工作，她是教务处长。她就把我写的那些诗拿过去了。拿去以后陆先生看完就给我改，改完之后又还给我。哇！一看把我吓坏了，因为我的那些诗有的是我抄的，我抄一句李白的，我再抄一句杜甫的，再加上自己编的。我们那里的语文老师水平也不太高，经常看了之后说：“这首诗是宋朝人写的吧。”所以我觉得还挺骄傲的——我自己编的

也有宋人的风格啦。可是陆先生说了：“你这个是抄某某的，那个是活剥某某的……”全都一一指出来，写下来了。看了以后，我当时非常害羞，满脸通红，很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赶紧说：“不要紧，你不要害怕，现在小孩儿喜欢这个的很少，我爸爸说你要是想学的话，他可以给你讲一讲，但条件是你不能跟任何人说。”因为跟任何人一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说你反动，也是非常落后的、不求上进的做法。但是我觉得古代的东西很有意思，我就说：“行啊，我想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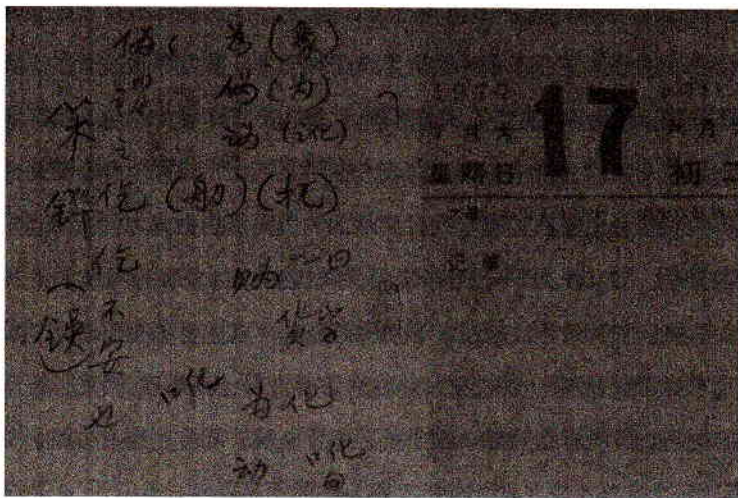
就在1973年的时候，我见到了陆宗达先生。陆先生是“反动学术权威”，在家里什么事都不让做，反省或者写检查吧。我一见到老先生，虽然不认识，但一下猜出这就是陆敞老师的父亲。陆敞老师让我叫她父亲“外公”，后来我就跟我的新“外公”学了四年的古文。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他那么有名，后来才知道他是全国训诂学会的会长、章黄学派的掌门人。我1982年毕业前到武汉参加第一届训诂协会时，陆先生做“文革”后的第一届会长。一起在那里开会的还有陆先生的同门，曾住在一起跟季刚先生念书的黄焯先生，他们两人是训诂学的长老。然而，1973年我碰到陆先生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是这么赫赫有名的学术权威，我只知道他很厉害，像字典似的，我从那么厚的书里抄出一句诗来，他都能知道出处。这把我吓坏了。记得第一次见到陆先生时，他就非常简单地告诉我：“你要想学古代文学，《全唐诗》你要看，《昭明文选》你要看，《史记》你要看，那么你就可以搞你喜欢的东西了。”我回去后马上就找来这些书。紧接着，他的女儿就告诉我：“你谁都不要讲，现在小年轻都不学这个，你自己要想学的话，就跟着我父亲学，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可不是正路。我父亲是反动学术权威，他是自己在家闷得慌才给你讲这个，但是你不能跟别人讲。”从那儿开始，陆先生每个礼拜就给我讲一次，后来我发现，不只是我，因为陆先生烦得慌嘛，只有我听课还不过瘾，给他拉煤球的那个推煤的人也听课，后来又多了一个人，旁边肉铺的那个人也来听课，还有一个是老语文教师也来听课，“文化大革命”之后他有很大成果。

那时候我就在陆先生家这么学，但是后来还是有人告发我说我学古代的东西。也有人劝我说：“你这么年轻，不追求上进，不争取入党，怎么搞这些东西呢？知识越多可越反动啊！”当时我就面对这个很重要的问题：知识多到底反动不反动？后来我一

想，这个说法不对，为什么？毛主席的知识很多啊，毛主席不反动啊。毛主席什么都知道，古代的、现代都知道，所以我知道一点儿没什么问题。所以我就仍然跟着陆先生读。结果呢？有人告诉书记了。所以领导就跟我谈话，说你不能再学古代的封资修了。从那以后，我念古书的时候就把毛主席著作放在古书的上面。我的办公室桌子冲着门，我就面朝门看《左传》，别人来了，我把抽屉一拉，《左传》就掉抽屉里了，毛泽东选集就在上面。别人问我看什么呢，我说毛选啊，别人就没什么说的了。陆先生每次讲的课我都记下来，所以现在我的笔记都在。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说第二年可以考大学了，我高兴得不得了，想念书嘛，一下就用上了，学的那些东西考语文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我又是教数学的，考数学也没问题。我起先是为考大学做准备，后来呢，我变成了想考大学的人的老师了。谁想考大学，到我这儿来找我给他们补习。我考上了北师大，当时为什么想考北师大没考北大呢？因为我想考历史系，那年只有北师大的历史系招生。为什么考历史系呢？因为我害怕搞文学，搞文学弄不好就反动了，跟政治关联太多。搞历史呢，用跟陆先生学的《说文》搞历史离政治比较远。当然我跟陆先生念书还有更好玩儿的故事。陆先生开始的时候给我讲唐诗，我很高兴。后来讲着讲着他不讲唐诗和文选了，而是讲起《说文解字》了。我觉得很没劲，因为那是学字儿啊。陆先生很有办法，他就从“冯”“胜”“利”三个字开始讲，他说你的“冯”字是两点儿加一个“马”，那两点儿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这“马”念“冯”啊？然后他就说，前面的两点儿是“冰”，“冰”是声音，“马”是意思，等等。虽然新鲜，可还是觉得没意思。于是硬着头皮听。后来就不想听了。但过了一段时间觉得不听也没意思，因为那个时候我教数学，数学不是我喜欢的，虽然我教得很好，学生很喜欢，可是这不是我的爱好。我想教的是语文，可是又不让我教。平时看书也都是看文史方面的东西，可是又没人给我讲。陆先生知道的很多，但是他不讲别的，他只讲字儿。于是我想，不学白不学，我本着这种思想就跟着听，这样一听就是半年一载的，结果呢，就有点儿上瘾了。所以我想这是陆先生设下的“圈套”，让我从文学开始，钻进圈套以后，他就开始从《说文解字》的第一个字、第二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讲，一卷一卷地往下讲，讲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考大学的时候我考的是历史系，学的是先秦史，一年半以后得知我们77

级的本科生允许考研究生，因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届的本科生小的比我小三四岁，大的比我大十几岁，年龄参差不齐，由于大家的背景都不一样，有的人积攒的经历很多，岁数也够了，所以允许考研究生。我就跟陆先生说了，陆先生说：“我现在可以带研究生了，你要不要来考啊？”我问：“我能考吗？”他说：“你已经学了那么多，可以试啊，你现在别的不用准备了，就把你的外语和政治搞一搞就行了。”结果一考我就考上了。考上了就跟着陆先生又学了三年。从头到尾，我跟陆先生学的是传统的朴学。朴学是什么？朴学就是小学。就是文字、音韵，训诂之学。



陆宗达先生 1977 年
给我授课时的笔记

所以说，我在北京和平门中学教学时跟陆宗达先生的学习相当于过去的上私塾，到 1977 年考上大学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1979 年考到了中文系读研究生，三年之后毕业留校。我想我毕业后自然而然地就是在古汉语教研室教训诂学或者教古汉语了，然而，分配的结果让我透心凉：不能进古汉语教研室，要到大学语文组教大学语文。这不是大材小用吗！大学语文是什么啊？教学生写作啊！大学语文讲现代和古代汉语、现代和古代文学，总之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一点儿那一点儿，都是普及性的东西，而且对象也不是中文系的学生，而是全校本科学生，就是公共课。而且最难、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改学生的作文，每天作文一大摞，每天是硬着头皮改。陆先生跟我讲：“你不要不高兴，这个东西对你有好处。”我心想，您就是没让我上古汉语教研室所以安慰我而已嘛，有什么好处啊，我才不要这好处呢。要说真的好处，您让我去教

训诂嘛。中文系还有一个老先生，叫启功。他跟我们讲：“真正课教得好的，是不备课的。”一下我们就高兴了。教研室主任说：“不备课，是因为都吃到心里的缘故。”启功先生说，他开始就是教大学语文的。这给了我一点儿安慰，我教大学语文教了三四年，后来才有教古汉语的机会，我在北师大教了四年。

1986年我就冒出一个想法，我要考博士，陆先生那时候开始招博士生了。可是系里说：“你不能考，你是陆先生的研究生，留下来工作的时间太短，不能考。”可是我一看，现在不能考，再过几年我可能就考不成了。怎么办呢？于是我有了一个非常怪异的想法——有时候怪想法没准是不错的：什么是训诂学？训诂学就是研究词义的演变、文字的演变、声音的演变。但什么是演变呢？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在《中国语文》上有一篇文章，说美国有一个叫拉波夫（William Labov）的学者是社会语言学创始人，跟他对着的是形式句法学的创始人乔姆斯基。朱德熙先生说，美国的这个学者是专门研究变异和变化的（variation and change）。我当时就想，我们研究训诂学应该看看演变的理论是什么啊！从1973年我听陆先生的课算起到1986年，我跟陆先生磨炼了十几年了，而且当时陆先生讲的课我都记下来，回家整理好，争取都记住，很是用功。有一个小插曲说明我怎么用功，让我知道陆先生怎么真正想教我。陆先生让我进入《说文》圈套、让我喜欢上这个以后，我就问陆先生：“外公，要学您这个，怎么开始真正地学呢？”陆先生眼睛一大，很正经地说：“你真要学吗？到中国书店买一套《说文解字段注》，读段注。”我马上就去了，我当时不是在和平门中学教书嘛，琉璃厂、中国书店就在旁边，我去买，结果没有那本书。但我是班主任，我的一个学生的父亲是琉璃厂古书整理组的组长。我跟学生说：“给你一个任务，请你爸爸帮助我买一套《说文解字段注》。”他马上就给我买来了。然后我就拿着书跟陆先生说：“外公，我买来了，您看怎么办？”陆先生说回家点读。怎么点？古书没有断句，读的时候要用红笔点断句读。于是我就回去点书，点了一两页发现这根本点不断嘛，也不懂，而且点的肯定都是错的。所以我就拿回去问先生：“我不会点，您看对不对。”陆先生说：“我不看，从头点到尾点后，你再拿来给我看。”我说：“我点的都是错的。”“不怕你错，就是怕你点不到尾。”我说：“那错了怎么办？”“你就从头点到尾，再拿来。”说完就不理我了。我回去琢磨琢磨，那就点吧。整整花了半年多快一

年的时间，我真的把那部段注一个字一个字从头点到最后一页。后来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几个陆先生的研究生有一句口号：把青春献给双行小注。古代文献都是大字的是原文，下面用两行小字来注解。没有标点，我们就点断句，天天点。最后是谈恋爱也点，女朋友也点，女朋友不点，我就不找。就这样，点、点、点，最后我找我太太的时候，当时她都跟着我做卡片。现在看来，我们的确是把青春献给了双行小注。等我点完段注的时候，陆先生非常高兴，说：“你居然点完了！”接着就说：“再点一遍！”我说：“哎哟，这不是闹着玩儿的。”但是他真的让你再点一遍，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外公开始真的给我讲《说文解字》的学问了，讲的和以前不一样了——全方位地讲，文字，字的字形、语源，古韵的通转等。我发现原来如此，陆先生之前给我讲的是一回事，现在讲的是另外一回事。当时分配到大学语文组后，想到这么多年的功底都用不上了，心里很不舒服。后来才知道，先生让我打的是文学系的全面的基础。因为我是从77级跳上来的，很多的基础不够，所以教大学语文，整整三四年的时间我把这些基础都打好了。到了1986年的时候，我的想法是：在先生教我的这个功底之上，还有什么东西要学呢？那就是演变的理论，朱德熙先生说拉波夫有这个理论，而实际上呢，陆先生也提过：章太炎先生是接受过国外理论的，所以他才有突破。太炎先生是季刚先生的老师，季刚先生是颖明先生的老师，所以我们学的是“章黄学派”的学问，是最传统的，是国学里的国粹。但这不是故步自封、闭门造车的学问。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也应该像太炎先生一样，不能死守着传统不变。于是我有了一个怪异的想法，或者说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叛逆的想法：能不能跟拉波夫去学。当然不可能了，怎么可能呢？第一，我的外语虽然在考硕士之前学了一些，但是进了研究生院以后，陆先生就让我们在三个月内把外语全部过关，以后不许再碰，全部的精力和青春都献给双行小注，因此就没有外语能力了。我也知道自己外语不行，要想出去，必须学好外语，所以我在那时候就准备英文，一方面申请，一方面学外语。就在这个过程中，拉波夫跟我讲：“如果你要来的话，我们可以给你资助。”我不太清楚他的资助是什么东西，于是拿着他的资助信，找了一个外语系的朋友让他看拉波夫给我的信。他看完后问我怎么得到的这个奖学金，说这是天上掉馅饼。他告诉我这是四年全奖，而且这个全奖是不需要干活儿的。我问他钱够吗？他说这个钱当然多是不多，

文科的资助都没有太多的，可是养老婆和念书足够了，人家又不是让你发财。我问去吗？他说像这样的机会你要是不去的话太可惜了。我考虑了很久，自己不是外语系专业的，出去可能念不下来。但机会很难得，我可以到那里好好学学外语嘛。外语过关了，我就可以阅读外文了，就可以知道拉波夫的变化理论了，那么将来再搞训诂学就会有新的心得了。

于是，我就出去了，现在想来真是胆儿大。人生有时候还真得有点儿破釜沉舟的勇气。起先还想要是学不下来就回来，到那儿去之后发现，根本回不来了。为什么？你不敢回来了啊。你回来之后，你的同事和你下面的人就说你败兵而归，脸没地儿放啊，所以叫“破釜沉舟”，硬着头皮也得学好。所以我的一个人生经验是：天下无难事。我母亲总跟我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只要你真正把精力放在上头，没有不成的。什么叫把精力放在上头呢？就是你脑子里没有第二件事，就这一件事，什么都不想，连老婆都得忘了。我的女儿那时候才两岁，正是最好玩儿的时候，离开老婆和孩子，想想有多难受。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现在机票一千多块钱，当时的机票贵得不得了，而且我又没钱。电话打一个一抬起来就是十美金，然后一分钟一分钟的再往上加。写信的邮票都舍不得买，写在一张纸信封上，写完之后折折之后就是一个信封，邮的时候很便宜，我和太太就拿那个来交流。为了更好地学外语，我跟美国人一块儿住，有半年的时间我一句中文都没说过，不见中国人——不是不想见，而是不要说中文。就是逼着自己那么做，脑子里做梦的时候都是这个。

我的宾大学习经历里，离不开拉波夫的关爱。2010年在哈佛开第18届国际汉语学会的时候，我把我的另一个导师 Tony Kroch 请来做大会议报告，他是搞历史句法的，我跟他聊天时说起我的历史，他说：“你看，你现在能用英文说这说那，可是不记得吗，当时你来的时候英文很差的呢！”我说那时候你干吗要我啊？他说：“实际上你得感谢拉波夫啊！是拉波夫说你一定能学出来的。是他要你的，他说你那时候已经发表文章，是个学者了，你真得谢谢他。”我对拉波夫一直心怀感激。当时他对我说：“你第一个学期得上两门课，这两门课无论如何你不能低于B，如果低于B，你的奖学金就没了。剩下的课是跟我上的独立研究（independent study）。”我每个礼拜见他一次，一个小时不到，有时候10分钟，有时候20分钟。谢天谢地，我的两门课，一个是B，

一个是 B+, 奖学金保住了。跟他的课就更有趣了, 学了一个多月以后, 他说: “哎哟, 每一次跟你谈话都不一样。” 半年以后他跟我说过一句话让我倍受鼓舞, 他说: “胜利啊, 我们都可以给你写小说了, 你现在都能够跟我自由对话了, 你记不记得你刚来的时候, 我说话你还听不懂呢?” 怎么回事呢? 就是高度的 concentration 的努力结果。而且我还有一个办法, 现在念书的人一般都不用了, 笨办法, 把上课的内容全部录下来, 回去之后听, 把它都写下来, 凡是到了我听不懂的地方就打上记号, 让那些一起住的美国朋友帮忙听一下。当时我就把一门“形态学 (morphology)” 全部录下来, 然后转写下来, 结果我写下来的笔记最全, 全班同学想看完整的笔记都到我这儿来。一年以后, 我听课和写作就没问题了。

外语关一过, 就开始了我从 1990 年到 1993 年的“学术转型”。上面讲的是上课的语言问题, 没有谈我的学术转型的过程。这个转型非常重要, 几乎所有的在国内受教育的本科生、研究生要想到外面进修、进一步做学术深造的话, 实际上都面临着学术的转型。我们的传统学术和西方的学术路径不一样, 这里我自己的感觉非常深刻。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在学句法学的时候, 教科书告诉我 “I like him” 不能说成 “I like he”, 因为 “he” 是 “nominative case for subject”, 是主格, “him” 是宾格, 界线分明。像拉丁文一样, 西方当代语言学里面就有一个定律, 即名词性的成分如果没有格位标志不能出现在句子里; 换言之, 没有格位的名词不合法, 必须删除。学到这儿的时候, 如果你的中文的历史观念很强的话, 马上就会得出一个强烈的意识: 如果某个语言没有格位也能说的话, 那么格位理论就没有用了。这就是现在我们很多当今学者仍然在坚持的一个想法, 西方的理论, 尤其是乔姆斯基的理论, 对我们的语言不适应, 因为他说的现象, 那个屈折语素我们没有。当时我在宾大读书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的老师 Tony Kroch 是乔姆斯基的很有名的弟子, 我就在课上质问他: “如果这个语言里根本就不存在你说的格位的话, 那么你这个理论就不能够成立。” 他的回答很直接 (用的就是西方学术的理论): “没有格位怕什么, 你可以设想它有一个格位啊!” 这很出乎我的意料,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没东西我怎么设想啊, 设想不是无中生有吗? 这能叫学术吗? 他看到我这副样子, 也不说什么了。恐怕是在想: “小子不可教也!” 他没法教我, 我也没法接受。我们搞训诂的 “有为有、无为无”, 没

有的怎么能假设它有呢！就在这个地方，出现的就是怎么样转型的问题。如果我坚持自己“故我”，结果就一条路，就是像我可怜的同学一样被语言学系踢出门外，他们叫“**terminate**”，意味着你语言学的学术生涯在我们系由此结束了。在国外，如果在一个系被“**terminated**”，你是不能到任何这样的系里继续读的，语言学就此拜拜了。我的一个可怜的朋友就是这样，现在想起来也还后怕。当然还有一条路，是我采取的方法，就是放弃自己的“故我”，忘记我以前所学的全部东西，从零开始，假设我知道**nothing**，我是一张白纸，我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太炎先生三智三愚的“愚”。我于是从“**introduction**”的书开始，从最基本的重新学习。不仅如此，我还看了些有关于为什么他这么样来建立他的学说的那些书，也就是科学哲学，看一些这方面的东西。慢慢地我才感觉到它的道理非常之深，感觉到如果没有经过痛苦煎熬的人是不能够有这样的感悟的。我当时是非常痛苦的，让你学一个你知道完全是胡说八道的东西，你学吗？不但要学，放下架子，你说它胡说八道是因为你有原则，放下一切原则从头学，最后你才发现它的道理所在。我说的学术转型，就是在几年当中，我不但学了课，还完成了我的学术转型；我不但能够知道他的道理何在，而且我能用他的道理跟他去**argue**；不但跟他**argue**，用他的道理还发现了原来我不可能发现的、非常有趣的东西。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张三派警察打了他”，其中的“他”指谁？“张三被警察打了他一顿”，这个“他”指谁？前面的那个“他”可以不指张三，后面这个“他”必须指张三，我就是通过从“形式句法学”学来的“**assumption**”的那个理论里，看到了汉语的被动句和英文的被动句完全不一样，给汉语的被字句提出了一个形式句法学非常特别的句法运作，就是说汉语的被动句是“**empty operator movement**（空算子移位）”。至今用形式句法学讲汉语被动句的人大多还在用我的这个说法，尽管很多新入门的研究生不知道这一点。那个时候的这类发现给了我很多甜头，因为发现了传统方法研究不能发现的汉语原有的特征。我马上把这些方法用到古汉语，发现古汉语也是如此。后来（2000年）轻动词句法的引进以及2005年发现的古汉语“无介词结构”的轻动词句法运作，都是学术方法转型后发现的结果。

正在那个转型时候，堪萨斯大学招人，我去申请了。结果三个人进入最后的竞争，我得到了工作。据后来招聘的人说，是因为我有古汉语的背景。从那个时候开

始，我就考虑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怎样把我学到的西方的理论精华和我学过的传统的的东西结合起来，做一个不总是跟人家屁股后头跑的学术研究。怎么样不跟人跑呢？训诂是解释词义的学问，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则离不开语音，“训诂之旨，存乎声音”，没有声音，训诂不到位。那么这个原则能否用到我们现在的研究上？我就想，声音管词义，那么声音能不能管构词、声音能不能管造句呢？经过大概六七年的努力，我设计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现在叫作“韵律句法学”，当时我就用它来教中文。教学相长，不仅韵律语法和中文教学紧密相关，就是语体语法也不例外。我在堪萨斯大学教中文的时候酝酿出韵律句法学的体系，后来在哈佛大学教中文的时候，从书面语体的教学中发展出了语体语法的理论。

如果说在国内教大学的时间里我获益最大的是教大学语文的话，在海外教大学的时间里获益最大的是教中文。在堪萨斯大学学中文的学生整个加起来不够100人，那个学校里有将近3万名学生，不到100人学中文；可是哈佛大学有6000名本科学学生，有300人学中文，我得管理20多名老师的团队，一块儿来教。我从2003年到2010年在哈佛待了整整七年，创办了哈佛北京书院。哈佛自认为是全球最好的大学，自信自己的学生不需要到外面学习，2003年开始的时候，学校对我的这番建议表示怀疑，一认为哈佛没必要，二认为哈佛没人去。这是一个暑期班，我预计招生80人，但开始并没有得到支持，所以到2005年才办成。我把哈佛的学生从象牙塔拉到中国、拉到北京来学习。哈佛燕京学社的杜维明称赞道，此举意义非凡，这意味着哈佛开始走向世界了，走到中国来了。

由于哈佛学生自身能力高，有学生在学习之后能用中文写出优秀文章，并发表到《读书》上或其他的一些报纸上。我就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教学，同时也发展了这方面语言本体的研究。有如下几个方面：（1）汉语书面语。汉语书面语是自五四取消了文言文以后，从汉语白话和其他的语言因素综合出来新形成的正式语体。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书面语，去教中文。（2）语体学。有正式和非正式的特色、典雅与通俗的特色……而如何去表达？我将它们综合起来，汇合成一个独特的领域。韵律的研究还不止这些，从学术上，还想将它推展，推展到文体学。（3）韵律诗体学。古典诗歌最早的有二言诗，后来有四言诗、三言诗、五言诗、七言诗。六言诗几乎没有，三言诗

不发达，五言、七言最流行。为什么呢？在学术上，为什么的问题如果从根本得以解答，就能开辟出一个新的学科。我鼓励学生们就此问题继续探究下去。在前面研究了韵律构词和韵律句法的基础上，发展和开辟一个韵律诗体学。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三音节的音步如果没有成立的话，五言诗就产生不了，四音节的复合韵律词如果没有成熟的话，那么七言诗就产生不了。这是从语言的韵律机制上解释诗歌形式的存在、更替与发展。

国学，我是跟陆宗达先生学的。在学习文字音韵训诂的时候，陆先生本着章黄学派（也叫文献语言学）的学理和原则教我们。他常说：搞我们这行的，字就像天安门城门上的铆钉，少一个都不行。此处先生说的“字”是指《说文解字》上的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字，一个一个地学，一个都不能少，才能把传统国学的基础打好。西学，我是跟随拉波夫学习的，他是社会语言学的创始人；还有托尼·克罗克，他是历史句法学的著名学者；还有马克·李伯曼，他是当代韵律学的创始人。在西学里，机制是研究任何现象的根本，西方学术最关心的是机制。我以此建立韵律句法学，也尝试建立韵律构词学，同时还发展出了韵律诗体学，甚至希望将来到达韵律和认知的关系研究。最近主编的《语言学中的科学》则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赵元任曾经讲过：如果汉语没有双音节的节律，中国人会有这么强的阴阳、乾坤的概念，是很难想象的。换句话说，我们自古以来相对相成的观念，很可能和我们的语言特征有关系。到底是不是还需进一步研究？而这个研究方向的启动和发展，使用的就是语言机制这一工具。

从我国开始派留学生的清朝末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说法：出去留学就要把他们的精华学回来。不要把金子拿回来，而是要把他们点石成金的手指拿回来。什么是西方学术点石成金的手指呢？我所理解而且得益的就是演绎逻辑。这要分几个步骤的训练才能得到。举例而言，在语感上觉得“皮鞋厂”比“鞋工厂”好，还不算真正的最高层次的研究。要想达到学术研究方面的最高境界，需要攀登八个阶梯（或等级）才有希望达到最高峰，亦即学术研究的八层级：（1）Observation（尽观察），（2）Classification（准分类），（3）Characterization（掘属性），（4）Generalization（建通理），（5）Abduction（溯因推理），（6）Deduction（演绎推理），（7）Prediction（预测有无），（8）

Verification (核验现实)。

具体怎么做呢？第一是“观察”。比如观察到“皮鞋厂”(2+1)比“鞋工厂”(1+2)好，“种植树”(2+1)和“开玩笑”(1+2)……。第二是“分类”。当说出哪些好、哪些不好时，就是在分类。大学生即可做，也是研究生的准备。而真正的研究生水平得登上第三个台阶，即“分辨每一类属性”。第四是“概括”。学术的基础就是要对现象的类别给出最一般性的概括。概括就是要给出一个判断句，其中必须有绝对的词汇（所有的、一切的、凡是），不然不能做任何逻辑上的推衍，是不能运算的。比如“种植树”和“开玩笑”的分析就是：凡是动宾结构，动词是两个音节、宾语是一个音节的都不合法。注意：有了一般性的概括后，还要努力发现反例、特例以及例外，进而来处理反例和例外，这个过程才叫作学术。有了诸多的相关的不同的概括，才能够真正开始登级似的学术的开端。我说博士生的论文就应该从概括开始，但很多博士生到概括就完了，这就是我们走不出新的学科来的原因。我们希望有大师级的人物来开创新的学科，这就需要把这些概括综合起来。第五是“假设”。假设不是假的，而是设立一个可以证实推衍的思想和理念。但若到此结束，那么学术就不成体系，这一学科就太单薄，很可能站不住。第六是“演绎”。根据通理和假设的道理，会产生哪些逻辑的定理和结果，这就是演绎。第七是“预测”。“在什么情况下，会怎样”以及“如果理论上会这样的话，那么现实中应该有什么或应该没有什么”，这些就是预测。预测的结果就是要回到现实中来，看看现实中有没有通过演绎预测出来的事实。第八是“证实”。在现实生活中证实它。

可见上面说的八个层级，前四个是基础层次，后四个是提高层次。如果从上述第一到第八反复推衍，方面足够而又可集中而成为一个体系的话，就能构建一个独立的学科。这里还要强调想象的重要性，没有想象力，不可能创建学科。作为科学的语言学的含义就在于此：它可以帮助我们寻来和达到学术的最高境界。

有人问我：钱学森问我们的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家来？从东西文化比较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说：西方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根本在“演绎逻辑”。东方关注的是“辩证关系”。如果把“关系”抽掉，就没有我们的特色了。我们的大学没有专业性的逻辑分析课（如 *Critical Thinking in [不同的学科]*）。而这方面的训

练课程在哈佛这类大学里是不可缺少的学术工具。我们没有产生大师的批判性思维的土壤。如果“不会想（从反面推演构想和设计）”很难有大师的产生。我想这可能是原因之一。其二，我们所谓的大师，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或明或暗地在使用西方标准（或需经过国外的认可），因此即使是有大师，没有国外的认可和鉴定，我们也看不到。第三，最重要的，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给足条件后自己成长出来的。长出来后，还要自己认得（或承认）。有时候不是没有，而是我们不承认（或不认得）。有人就此问我：如何用逻辑演绎做假设？英文是否更适合演绎思维或抽象思维？我的回答是：天下没有做假设的固定模式。如果有的话，那么下一个爱因斯坦我们就可以预测了。但假设也不是可以随意的，它是自己对研究对象的深度了解和自己对因果想象力的有机结合，这样才会有革命性的突破想象。这种想象也是下面的两个结合：一是已知对象的概括中潜藏的因素；二是主体对该因素的体现和反映的想象。因此同样的现象和事实，不同的人所得到的假设（想象）可能是很不一样的；同样的现实材料，能生成不同的理论。不同的理论是否成立不仅取决于它的假设是否可以推导出诸多的可能和不能，更取决于假设以后的演绎和预测再演绎和再预测。演绎预测不能成功，需要马上就推翻重来。总之，要训练科学的头脑。有人说“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大脑”，其实，这个问题可以反过来看：有什么样的大脑就有什么样的语言。大脑创造语言，但是不是它创造的语言还可以反过来激发大脑创造更多更深的思维呢？这是人类认知的大问题。我的兴趣也在于此。

（上面的文字是在于瞳和杜莹整理的第79期博雅大讲堂讲演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谨致谢意！）